

認識法光教師系列(三)

訪問高明道老師

採訪·整理／呂凱文

問：請老師談談當初接觸到佛教的因緣。

答：具體的因緣，我不記得。原來，家裡是信仰基督教的，因為老祖先住的地方跟歐洲宗教改革有很深的關係，不過我長大的環境——德國南部——倒是天主教的天下。我父母在信仰方面的態度也十分開放，即使不接受別人宗教的內容，每看到有人信奉宗教，都能夠表示讚嘆，並且對各宗教的文物擁有一份欣賞、恭敬的心。這些多少也影響了我。例如大概十歲的時候，母親送我古蘭經的一頁，是阿拉伯文書法，很美。我就把它掛在床頭上。

家裡環境之外，小學時，最要好的朋友中有一位是猶太孩子；後來班上還來了一個回教徒，是個土耳其小孩，不過跟他語言不怎麼通。總而言之，從小對其他宗教沒有什麼排斥。在學校裡，我們也上宗教課，小學、中學都有。班上如果有不同信仰的同學，那一課便分開上的——天主教的上天主教，基督教的上基督教等等。這個課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。小學先是講聖經的故事，舊約、新約都講；後來就開始介紹教義。到了中學，進一步涉獵基督宗教歷史。這個部分很複雜，有些也很不光明，但統統會講。這種坦白的作法實在很好。高年級還有一般宗教學的內容，包括世界宗教。介紹的方法是盡可能客觀傳達各宗教本身的說法，最後才特別說明從基督教的立場來看，該教見解如何，換句話說，不是一開口，就先否認別人的東西。雖然我那時對基督教的接受已不如先前，還是繼續上這些課。雖然在這裡沒有解決我信仰的問題，但是我仍然覺得收穫很大。

後來為什麼對佛教產生特別大的好感，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跟從小肉難以下嚥有關。在一個肉食環境裡，這種日子過得很苦。佛教對眾生的關懷以六道為範疇，不限於人，所以能為素食提出理論上的根據。這當時對我來講很重要。後來十三、十四歲時，母親知道我對佛教有興趣，就送我《增支部》的德譯本，是上世紀二〇年代的舊書。有意思的是，這個東南亞聖典的德譯本竟是在杭州的看守所裡完成的。原來譯者——著名的若那諦羅迦(€恁@ atiloka)比丘——因為是德國人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准留在英國統治的錫蘭，民國五年好不容易輾轉到中國。本來想從雲南回到他曾住過的緬甸，不料中國也向德國宣戰，害得他在杭州被關了起來。不過他仍利用這段意外「停留」的時光完成德文的《增支部》翻譯，也算是增上逆緣。

我看的第一部佛經的故事跟後來進一步的接觸一樣，都跨越了不同文化區。大約十五、十六歲時，我認識的一位學佛的老先生介紹我到一個道場，是當時慕尼黑一帶唯一的寺院，幾乎沒有人知道的。地方很小，設置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難民營裡，原是蒙古人創立的。我頭一次去正逢過舊曆年。冰天雪地，看到

兩位出家師父穿著西藏的僧服在矮矮簡陋的房子前走動，印象很深刻。當時在那個小寺裡，除了一位年歲已高的蒙古比丘外，有一位達賴喇嘛派的年輕的格西，是安多人，還有一位在達賴喇嘛尊者座下受過戒的匈牙利人。他通達的語言起碼十種，後來蒙他慈悲，指導我中文。

這所小道場雖然屬於格魯派的系統，但有時也有其他傳統的師父住在那兒，都很和諧。例如曾有位錫蘭籍的禪師掛單。他在城裡教四念處，住的卻是蒙藏的寺院。還有一位德籍的法師，是在英國受沙彌戒，在泰國受比丘戒的，長期住香港，中文好得好。大概是我高中畢業那個夏天，正巧他有一段時間住在這個小寺裡。路雖然很遠，我常去跟他學，坐在狹窄的客廳兼廚房，讀他帶來的金陵刻經處的舊線裝本——內容多半都是在《大正藏》編入《阿含部》的單行契經——，而老蒙古師父在隔壁房間喝西藏奶茶，看他的藏文書。所以在我的經驗裡，佛教一直是多文化的、跨越單一國家或民族的。或許也可以這樣說：我很幸運生在歐洲，沒有血統認同的壓力，可以平等地欣賞亞洲各地的佛教。

問：老師怎麼會到臺灣來，又怎麼當老師？

答：業力吧！我當時看歐洲的佛學研究，巴利語、梵文很強，西藏、蒙古方面也有不錯的發展，唯獨中國佛教簡直一片空白，所以就想，別人已作那麼好的部分，我不需重複，而他人不感興趣的，也許可以試試。當時大陸正逢所謂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，對傳統文化——包括宗教——加諸空前的破壞，不能是一個可以學到我想學習的地方，而我在中學的時候已經跟臺北華嚴蓮社的成一法師有一些信件來往，所以在服役後，很自然決定來臺學習。那是民國六十三年。成一老長老看我的土樣子，建議要上大學，結果我前後在文化讀了中文系所長達八年，畢業論文研究跟《如來智印三昧經》的翻譯有關的問題。那時國內恐怕還沒有這種論文，而且中華佛研所的前身還在華岡，所以陰錯陽差，受聘當佛研所的老師。這也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因為我並不是佛學出身的，老實說，對這個學問一竅不通。

問：老師目前在教學與研究大致都朝著哪一個方向？

答：因為孤陋寡聞，才疏學淺，可分享的知識或可處理的研究實在太有限，很難談得上什麼方向。我注意的倒是基礎。要把學問作好，基礎就要堅固，而由於個人背景——在中學讀了九年的拉丁語、四年的古希臘語，接觸到歐洲傳統的文獻學，讀中文，又是受樸學、考證的薰陶——，對語言文獻學方向的把握就頗為重視。歷史、思想（哲學）的研究以語言文獻學為前提，所以我也許在這方面我可以為同學提供一些服務，因為他們往往對義理感到好樂，卻不清楚如何較踏實地切入。

另外，至於資料，我也一直想辦法讓同學接觸到新訊息，希望他們可以打開視野，擴充知識領域，在自己的研究生涯裡不要扮演井底蛙的角色。

問：對於法光的學生，老師有沒有什麼鼓勵的話要說呢？

答：鼓勵不敢當，但互相勉勵可以。在我來看，心態方面有一個得注意的重點——「惜福」。在此，這個詞怎麼理解嗎？就自己的處境來說，今天有機會讀書，便是莫大的福報。你看，這世界上有無數的人一輩子沒有因緣入學、識字、讀書，而能生在一個文化的地方，進而有種種學習的條件，依照佛教的觀點，是件希有難得的事，因為沒有文化、缺乏學校的環境遠遠多過像你目前這麼好的環境。這當然屬於因果的範疇。問題是：如果把現在的條件看成理所當然，就不可能好好珍惜。因此，今天自己有因緣、有機會多看一些書，多讀一點經，多獲得知識或多作點學問，對個人的生命來講，是一個極其殊勝的因緣。我覺得大家必須先體會到這個事實。

接著還應該有一番進一步的有關「惜福」的思惟：法光佛研所的硬體設備與圖書典藏那麼好，這一切端賴眾多因緣，才能夠達成的。假設沒有人護持，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優厚的條件。所以應該由衷珍惜，方能實質報恩。舉例來說，大家要好好、妥善地使用圖書館的資料，不然那些書本、學報、雜誌擺在那邊，堆積如山，無人利用，形同廢紙，了無意義。我們該詳細閱讀，深入思考，免得因視為理所當然，白白浪費得之不易的福報。

再說，一個研究所畢竟不但是由房舍、桌椅、圖書等物質構成的，它還涉及許多人的參與——從幕後默默護持的施主到行政人員、教師和同學。大家跟這個地方有緣，而這個地方也靠大家才能夠發揮功能。所以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必須建立在思惟因果、惜福培德的立場上，否則一旦發生什麼小事情，個人的理性與佛法素養馬上就被煩惱所覆蓋，自己痛苦，無心讀書，又令別人不平，衍生出難以收拾的惡性循環。這太不值得了！不如針對自他、事物都養成惜福的習慣來長遠保護自己，改善環境，作點對眾生有利益的事。